李光地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 建 国

全国首次李光地学术讨论会9月28日至30日在李光地的故乡——福建省安溪县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首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福建省一些高等院校及地方的理论工作者和《光明日报》、《人物》等十几家新闻出版单位的记者、编辑。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62篇，内容涉及政治、理学、易学、史学、军事、自然科学、文学、音韵、训诂、农业、河务、民俗、人物评价、祖籍家世、民间传说等方面。学术讨论会气氛热烈，专家、学者们各抒已见，发表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参观了李光地的湖头故居。

学术讨论着重围绕李光地的历史地位、学术思想及其在科技、文学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李光地的历史地位

客观公正地评价李光地的历史功绩，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这次讨论会最为突出的论题，也是会议取得的主要成绩之一。

由于李光地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旧时代某些史学家对其人格上的訾议，长期以来，不仅使李光地这一杰出的历史人物蒙受不应有的指责，也妨碍了对李光地研究的深入。针对这一点，与会的专家指出，我们今天评价李光地的功过是非，主要应着眼于他在当时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应该纠缠于细枝末节，舍其大而识其小，以至把握不住问题的要领。与会同志认为，李光地为官近五十年，正是清代社会发展转折时期，即由清初社会生产凋敝、国家尚未统一，逐步走向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康乾盛世”。李光地对于清初历史的这一转折，对于“康乾盛世”的到来，起了推动作用。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在耿精忠叛乱和郑经骚扰福建期间，他既不畏耿逆的胁迫，又坚拒郑经诱说，表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同时，积极筹划，上《蜡丸疏》，又遣人迎接平叛大军，指引道路，平险隘、治浮桥，馈物饷军，为平定叛乱立下大功。

2、在规取台湾、实现海峡两岸统一这一伟大事业上作出贡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李光地在这件事上的主要贡献有三：力排众议，建议清朝抓住时机进取台湾；保举施琅为将；支持施琅利用南风出兵的计划，使进兵台湾的军事行动顺利进行。对李光地弃台不治的主张，与会同志的评价略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李光地放弃台湾的意见是愚蠢的，表明他没有看清台湾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心也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所以力主攻取台湾，主要是从消灭抗清力量，攻固清朝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角度考虑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年台湾的地位不象今天这样重要，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如同今天这样重视台湾。况且，当康熙帝决定在台湾设治时，李光地立即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而提出了派兵防守的积极建议。他的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3、培育人材，荐举贤能。许多学者认为，李光地的仕宦生涯中，有相当长时间担任学职

和铨职，在人材的培养选拔、官吏的考察与任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直隶任职期间，他疏请廓清学校和科场积弊，创设义学，亲临授课。对于后者，循循善诱，大力扶植。在近半个世纪的居官生涯中，由他荐举并受到重用的人才不知凡几，其中成为一代名臣的就不下数十位，故有“本朝诸名公称善育人才者，必以光地为首”之说。

4、黜墨击贪、保护善类，在康熙朝的吏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光地深疾官吏之贪墨，“闻人之不善，如芒刺在背”。他上疏举劾贩卖私盐的云南布政使张霖。又如，大贪官、两江总督噶礼的被诛，实亦由李光地赞之。同时，他还多方保护善类，受其保救的清官贤臣很多。在保护善类一事上，他都是选择最好的时机，最佳方式从容与事，故能屡见成效。

5、实心为民、清廉勤政。李光地在内阁学士任内，敢于坦陈已见，颇受康熙赏识。在吏部尚书任上，对兵制、官俸、蠲免等多有建言。而蠲免一项，是康熙朝息养生民、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得到康熙皇帝的嘉纳。尤为可贵的是，在直隶巡抚任上，诸如治河、捕蝗等，他都身先属吏，不辞辛劳，或奔忙于治河工地，或遍历郡县视察灾情，为一方官员树立了勤政为民的楷模。与会学者高度评价李光地治理永定河的功绩，认为他在治河过程中尽心尽力，勇于任事，使号称难治的永定河在一定时期得到治理，在其后三十多年河水不泛滥，民人得以安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李光地生前及身后之所以颇遭物议，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清代史家全祖望提出了李光地生平“三案”，指责李光地“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二百多年来，“三案”成了正确评价李光地历史功过的一大障碍。因而，这次讨论会有多位学者撰文对“三案”进行澄清辨析。有的学者指出“卖友”和“夺情”二案都是在当时廷臣结党，互相倾轧这一政治背景下出台的，是李光地政敌用来攻击李光地的口实，我们不能据一面之词而立论。有的同志详细分析了《蜡丸疏》起草和上奏的经过，认为疏文的起草与陈梦雷无关，所谓李光地“卖友”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应予推翻。至于“夺情案”，学者们认为，夺情并非李光地“贪位忘亲”所致，而是康熙帝一手裁定，以夺情而诋斥李光地的大节，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实际。至于“外妇之子来归”一案，有的学者指出，无稽流言，市井浮说不可载入史家论著。以所谓“外妇之子来归”赅括李光地暮年大节，既不严肃，亦无见识。

二、李光地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李光地作为康熙皇帝的文渊阁大学士，对于清王朝思想统治重心的确立，有关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一代学风的倡导，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低估。他一生著述有 30 余种，数百万言，提出不少新说，在众多学术领域都有建树。

1、李光地以性为本的理学思想：

与会学者认为，程朱理学以理为本，阳明心学以心为本，李光地则以性为本，他既扬弃了陆王心学，也扬弃了程朱理学，形成兼采程朱陆王、别具特色的理学思想体系，是清初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个理学思想体系具有突破传统和革新传统的积极意义：李光地从批判“阳善阴恶”、“道心善、人心恶”的理学命题入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中世纪禁欲主义，提出了“人欲非恶”和“公天下之欲”的近代人文主义命题，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行将走出中世纪的某种时代要求。

有的学者认为，从明中叶到清初，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尤其是阳明学的盛行，使以朱子学为主流的中华民族文化处于低谷，清王朝虽然建立，但由于其原有文化的落后，又

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日渐式微，整个国家思想空虚，文化混乱。因此，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李光地等理学名流复兴朱子学为主流的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不仅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且起了"返本开新"的作用，意义深远。有的学者还据此对李光地捍卫文化传统和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李光地复兴朱子学在肯定的同时又有一些保留。有的学者认为李光地对朱子学有严守的一面，也有其自身富有创意的一面，但从总体看，其理学思想似较保守，尤其是对理学理论的发展未能做出新的突破性推进。有的学者从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李光地对于朱子学偏重于继承和阐发，创见不多，但也有其特点。其一，与康熙帝呼应强调"内圣"与"外王"的一致性，提倡朱子学是因为有利于治道。其二，适应康熙朝统治的需要，确定阐发朱子学的重点，把"理气"、"心性"、"气质"、"智、仁、勇"、"知行"、"立志"、"主敬"作为尊朱要旨。其三，"尊朱"而不仅仅限于"述朱"。同宋明以来的"述朱派"不同，李光地在某些问题上敢于与朱熹持不同意见。理学发展到明末清初已进入衰颓期，在康熙朝，虽然皇帝亲自提倡朱子学，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康熙朝毕竟把封建统治稳定下来了，满清贵族的封建化，就满族来说，是一个历史进步。康熙或李光地把提倡朱子学作为克服明末王学泛滥所带来的社会上那种空谈心性的学风、士风这种弊病的药方，虽然并不全灵，但也应该看到朱子格物穷理的思想，确实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就有李光地的贡献在内。

有的学者提出了李光地虽是理学家，但他极重视汉学，认为宋学重理义，汉学重训诂、考据，各有优点，应该"融贯汉宋、汉宋之学兼收并采"。李光地提出的"汉宋折中"学术方向，为清代汉学的产生作了准备，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2、李光地的易学思想：

李光地的易学思想自成一家，在易学领域中创获颇多。在讨论中，有的学者把李光地易学著作总称之为"榕村易学"，并把它与"船山易学"作了比较分析，认为犹如《道德经》与《系辞传》是先秦易学的两座丰碑一样，船山易学与榕村易学在清代易学史上树起了两座不朽的丰碑。但是长期以来，所谓民族大义、夷夏之防、汉满之别，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学术界对王夫之评价甚高，而对李光地则冷落得很。其实，榕村易学是直接服务于康熙盛世，就其对社会生活发生的作用来看，它的实际影响较之船山易学，实在要大很多。

讲到李光地的易学成就，学者们首先推崇李光地主持编纂的《周易折中》。此书所采用的上自汉晋，下迄元明的历代诸家易说，多达 218 家，其中引用宋明理学的易说有 159 家。可谓集历代各家易说之大成，后人能深刻了解易学发展的脉络，从汉易到宋易的形成发展，其间积累二千多年的易学成就，保留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实为研究《周易》的一部不可或缺的书。中国易经是在 17 世纪传播到西方去的，恰好是李光地生活的时代。在当代，许多西方人已认识到中国易学真正的学术价值，"易经热"经久不衰。据有的学者研究，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对西方很有影响，鲍威特和莱布尼茨看到的《周易》，即此李氏本。

榕村易学的特色，是与会学者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榕村易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传统，把《周易大传》表达的有应有比和无应无比各自构成阴阳对立的排斥与联系思想概括的交易变易，很有创见。用交易变易来说明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很精彩的。李光地在讲易的阴阳转化还提出以类相生和反类相生的辩证法。榕村易学杰出之处是重在实际应用，以易致用形成榕村易学一大特色。李光地非常重视这一点，并把它贯彻到毕生修身治国的实践中去。从李光地以易致用的这一思想出发，可以引申出事物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论道经邦的政治辩证法，知险习险的人生辩证法。如其论"改革"曰："当

改革之时，妄动而往固凶，固守其常亦危也”。这一论述很值得一切有志于社会进步的人们认真记取。

3、李光地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一些学者从李光地崇儒奉朱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李光地具有民本思想，同时指出李光地适应清统治者的需要，强调保“本”是为了“安邦”，实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李光地这种民本思想与吏治思想甚至被有的学者视为他与康熙皇帝“义虽君臣，情同朋友”的政治思想基础。有的学者从李光地思想的双重性出发，大胆肯定李光地有明清之际近代商品经济萌芽和早期市民阶层反封建斗争的推动下，对古代民本思想中某些可以转化为民主意识的内容所作的阐发，在客观上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如肯定人民抗暴政推翻暴君的合理性，主张政治必须“征诸庶民”，提出了“合众人之公便是一圣人”等初步民主思想，表现出作为一个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特殊性格。

三、李光地在科技、音韵、文学等方面的成就

1、李光地对古代天文历算的贡献。李光地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虚心向他人，特别是向当时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梅文鼎求教，因而在天文历算的研究上取得不少成就。他在自己的科学论著中，能运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知识，并吸收西方天文学的成果，对各种天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李光地对自然科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对科技人才的推荐和培养上。梅文鼎就是经过他多次的推荐和宣扬，才得以知名于天下的。他刊刻算书，普及历算教育，设馆讲学，培养历算人才，为清初历算学界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学者们认为，李光地的天文历算研究能“贯通古经，洞名根底”，几乎涉及清初天文学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

2、李光地的音韵学研究成就。李光地在音韵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改良旧时反切，新作“合声”反切和运用等韵学理论来划分音类，表明音读。“合声”反切，拼读没有阻碍，比《广韵》反切优越得多，达到了反切方法的最佳点。学者们认为：李光地在音韵学上能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所发明，用自己的见解来创造、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的音韵学著作，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的音韵学。

3、李光地在诗文创作及理论研究上的成就。李光地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康熙盛世”的社会生活，大胆披露了这个时期人民的疾苦、官场的黑暗；寄托了作为一代王朝“名臣”勤政爱民的政治抱负；流露出“名臣”对宦海浮沉生活的厌倦；抒写了去土还乡的真实情感。他的诗作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也可以说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关于李光地的诗歌创作主张，学者们认为在注文论诗上，李光地继承了儒家“文以载道”、“诗贵志高情厚”、“人品决定诗品”等一系列见解，是清初颇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之一。有的学者还从李光地对唐代大儒韩愈诗文的评注中，进一步考察李光地理学思想的内容实质，进一步开阔李光地研究的视野。因而，从诗歌创作和诗文评注来探讨李光地治学思想和道德情操，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另一显著特点。

除上述内容之外，与会学者还就李光地的家族源流、乡族观、安溪民俗及有关碑文等方面也作了探讨和研究。

全国首次李光地学术讨论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仅出现了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同时，交流了学术研究成果，扩大了研究视野。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李光地的研究还是个崭新的有待进一步挖掘的课题，未来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其中，尤为重要者，我们有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做指导，能够将宏观的总体把握同微观的具体考察相结合，广泛联系，视野开阔。可以预见，有关李光地的研究势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前人的成就。